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 文史资料專輯

内部資料 妥为保存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印

前言—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陈 望 道

今年的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清朝政府为了維持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只知割地赔款，魚肉人民，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走狗。以偉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人士，当时为国家的忧患而奔走呼号，引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展开了斗争，以爭取民族的独立，企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人民当时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繼，坚苦斗争的结果，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对于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統治的秩序，造成民主主义思想的高涨，推动中国广大人民的觉醒，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但是它沒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統治，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的成果最后仍被袁世凱所篡夺，中国依然存在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閥魚肉人民、爭权夺利的极端混乱的局面。此后，中国的爱国有識之士，虽然繼續不断地为国家的忧患而痛

苦、而焦虑、而奔走，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都沒有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辛亥革命时期，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借取革命理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西方有迷信，对帝国主义有幻想，认不清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看不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勾结关系，因此，他们沒有能够提出明确的反帝斗争的纲领。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一度猛烈发展的情况下，采取了“和平”的伪装，宣布所谓保持“绝对中立”，借以投合当时革命分子的幻想，避开人民革命斗争的直接锋芒，以便赢得时间，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统一对付革命的步调，物色适应新形势变化而又最能为自己尽忠的新工具，用来绞杀中国人民革命的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却幻想帝国主义会“支援”中国革命，“赞许”中国革命，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终于使辛亥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之下而失败。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推倒君主专制政体之后，只建立了一个虚有其名的共和国，沒有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彻底的决裂，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不但沒有及时提出引导人民群众继续前进的新目标和新口号，反而以为反清胜利之日，即为革命功成之时，甚至把革命果实拱手让人，以革命党“不当官”为清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准备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利用了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作为反革命

的阵地，很快就破坏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一些民主制度。

中国人民群众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这种力量，因此，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以消灭帝国主义统治所凭借的社会基础。当人民群众自发起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回击的时候，资产阶级完全暴露了不敢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态度；同盟会时代提出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急进口号，也被所谓“注重民生政策”的空洞口号所代替。这样，它就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面前，不能不表现得软弱无力，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而且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反复的残酷的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积累了经验，因而促进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之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九二一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的局势立即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经过四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终于彻底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行

程。前后五十年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资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不可能把中国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解救出来，中国革命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终不免于失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保证，这就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之中用血肉换来的一条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十分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非常珍贵的一课。纪念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重温五十年来的历史经过，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辛亥革命艰苦斗争的经验，充分地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不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贡献我们的力量，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坚持不懈地斗争。

目 录

- 前言——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陈望道 (I)
上海商团攻打江南制造局正門紀实
..... 傅昌裕述 楊小佛記 (1)
光復上海——巡防營和吳淞炮台 周南陔 (5)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聞界的动态 严独鹤 (12)
为蜀軍返川到武昌与革命軍政府商議借道 ... 任鳴鶴 (21)
憶往事 赵志道述 楊小佛記 (24)
辛亥杂憶 宋式虧 (26)
海琛、海容、海筹三艦反正 楊慶貞 (41)
辛亥革命在浙江 蔡敬恩 (46)
辛亥革命前后的安徽情况 李次宋遠著 (95)
川南起义始末 劉潛蓀 (102)
辛亥革命在膠東 義慈甫 (107)
太原起义和河東光复的片断 薛篤弼 (113)
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見聞 袁希洛 (125)
記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处 任鳴鶴 (140)
起草“清帝退位詔書”的回憶 ... 劉厚生述 严殷周記 (145)
記秋瑾 徐双韵 (149)
陈其美二、三事 許炳堃 (172)

上海商团攻打江南制造局正門紀实

傅昌裕述 楊小佛記

清宣統三年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商团起义，攻克南市江南制造局，一举而光复了上海。

当时我是一个杂粮行的学徒，由于受了报纸上时事插画和同业曹铁甫先生秘密借给我革命小册子的启发，深恨帝国主义者横施侵略，清廷丧权辱国，因而在业师叶惠鈞的赞同下，参加了上海商团。

上海商团公会由李平书、沈綬云、王一亭、叶惠鈞等发起組織，委朱少沂为总司令，馬驥良、俞澄昆为沪軍營南操場教練員，顧澤明为九甫地北操場教練員，共有團員500余人，南北二操場各編三队，團員全屬义务职，服装以及打靶的彈藥一律自費，大部分團員經朱、馬等二年多來的教导，已具有兴汉灭清的爱国思想。

起义那天，我已是上海商团公会基本队第三队队长，奉命率队攻打制造局正門，亲历其事，因追忆其經過于后：

九月十三日午刻，朱少沂总司令命我一时前到沪軍營集合，到时各队均在整队集合，我队奉命派哨守卫四周要道，这时刘福彪率领的革命党便衣敢死队約200人，紹續开到南操場，其中穿长衣穿短衣的都有，整队时脱下长袍，堆在地

上，好象一座小山。不一会，朱总司令宣布总指挥部决定今天武装起义，随将革命旗帜升上旗杆，又取出白布袖章二捆，一捆给敢死队，一捆给商团，并问商团中人有没有愿充敢死队员的，举手站出来的有十之四五，请示总指挥部以后，朱传达说商团不必产生敢死队，于是各归原队。

各队领到的武器只有步枪几枝，其余是大小不一的手枪、木柄手榴弹、炸弹等，还有一些人只领到单刀，准备在火线上呐喊助威。

这样等到下午四时左右，总指挥部下令：“刘福彪带领敢死队出发进攻江南制造局”商团各队仍在待命，傍晚消息传来，刘等虽冲过警戒线，但被制造局二道铁门强大机枪火力所阻，只得退守各自据点，我方派出的劝降代表团谈判不成，革命党人陈其美被扣在制造局作押。大家正在議論时，命令下来了：“商团全部出发攻打制造局正門和西柳”，受命后不禁心中怦怦，因为我们虽經二年多的操練和受訓，到底未曾上过战场。直至踏上馬路，生死置之度外，倒又坦然了。

这晚幸而天公作美，月色不明，而且敢死队与其他起义部队已将沿途敌哨消灭，我們得以順利到达制造局，可是二道門火力仍旺，第三队团员和其他起义士兵都无法冲进正門，不得不臥伏巷道两旁，铁門里一見外面有动作，就开机枪，时射时停，如此相持到午夜，团员开始焦急起来，张沛如①、滕克勤②等說：“我們是否要靜臥等死！”张首先起立喊

道：“同志們，起來冲锋！”旁边躺着的起义老兵拖住他說：“机枪厉害，不可起立”，张反罵老兵胆小怕死，不听劝阻，向前直冲，行未数步，中弹倒地，再起再扑，終于不起，跟着前进的滕克勤，范更新等五六人也只能趴倒滾向墙根，这时我队死伤已有三四人，如滕克勤登高探路，下墜受伤，柴九松④重伤不治而死，我的左手也中彈断一指。

此时我們既痛同志們的伤亡，又知“上海道”已电告消廷說：“商团全叛”，于是群情激昂，人人抱必攻必克的决心。旋見西棚起火，紅光烛天，杀声四起，正門机枪停而不繼，趴伏墙根的范更新便冒险蛇行到二道門探視，看到里面步枪已搭起枪架，插了白旗，清兵百余站立一旁，等待投降。范大声喊道：“他們投降了！”我們就蜂涌进入制造局，时已九月十四日晨六时二十分了。

攻克制造局后：据传杭州清兵随时可以下来，各队发到局存的新步枪和彈药，就地防守了五日五夜。

事后知道西棚放火系九亩地操场的团员潘月槐、夏月潤兄弟和小保成④等伶界队员所为；清軍官佐均从該局江边碼头乘船逃去；陈其美为朱少沂等救出。

商团成员包括极广，如王之栋是制造局打样职员，經常供给有关情报，王建中是江海关大写，陈琴軒是英美烟公司大写。上海光复后，各业紛紛自組商团，团员总数达五千余人，均归上海商团公会节制，及袁世凱窃国称帝，深忌商团之革命传统，始强令解散。

注释：

- ①张沛如是一家絲綫店的小老板。
- ②据滕口述：“余与傅昌裕都是上海商团基本队的团员，且同属于基本队第三队，基本队共有四百四十五人。有董事十四人，如李平书、沈綬云、王一亭、曾志忞、张乐君、李詠裳、陶秉鈞、苏穎尚、郁屏翰、叶惠鈞、王宝嵩、叶鴻英、虞洽卿等。”并云：“九月十三日閩北巡警臂纏白布，先行发功。同时閩北民軍敢死队队员一百余人，由张承标率领进入南市。下午三时民軍与商团二百余进驻沪軍营。沪軍营驻有老兵百人，事先接洽好，发一个月餉解散。当时由滕克勤向信成銀行沈綬云取到現洋三百元，立刻分发。”附記于此。
- ③小保成名叫邱治云。
- ④永昌元杂粮行，經理是徐杏书，我参加商团是得他同意的。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

(政协徐汇区委员会供稿)

光复上海—巡防营和吳淞炮台

周 南 陔

一九一一年，我年十九岁，以二品廕生，又經屢次保舉，得以道府分省，在上寶會丈洋商租地局任委員，管理財務。由于职务关系，与各国領事館、工部局、公董局、会審公廨的一些高级职员都有交际往来。我当时已参加了同盟会，組織上交給我的秘密任务是在外交方面进行工作。

那时，英租界望平街口，九江路与汉口路之間有一“公余总会”，它是“高等华人”所办的最老总会之一。会员不满百人，一般都是官僚、买办。美其名曰“接洽要公”，实际是大家聚在一起赌博叫局，大吃大喝，甚至貪賄納賄，借此运动門路。我看中这个总会，做了該会會員，以便从中展开联络活动。

上海华洋杂处，地当冲要，滿清政府在这里駐了五个巡防營，以三个營駐在高昌廟、南市、閘北和浦东，两个營駐在吳淞和獅子林。巡防營是由綠營改編的，每營有二百余人，五个營合計約一千二百余人。所用的武器是后膛枪，子弹配备相当充足。在当时革命党看来，这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反动武装。

巡防營統領兼吳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号文舟，貴州

人，湖北武备学堂出身。姜与我是同乡，其父曾任福建镇台，与我祖父（福建藩台）同寅，论起来，我们又是世交。同时，江南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号固卿）曾以候补道在福建办过督练公所，与我祖父颇有交情，姜经徐的提拔才做了巡防营统领，徐常在姜的面前夸奖我，因此姜对我另眼看待。姜秉性懦弱，优柔寡断，我不大瞧得起他，而组织上又没有要我联络军人，我也不便有所活动。

一九一一年二月，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失败了，于是同盟会的革命计划由沿海移到内地，特别着重武汉三镇。其入手办法以运动新军为主，而以所联络长江上下游各地的帮会作为第二主力。霹雳一震，果然在同年八月十九日爆发了武昌起义。这一起义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上海。

望平街报馆林立，率先报道起义新闻的是民立报（同盟会的机关报），继之而起的是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公余总会原是官僚、买办聚集之所，在那里有官场的消息，私人的电讯，以及武汉来往旅客的种种见闻，不但消息灵通，而且比较真实。我经常出入于公余总会，探听消息，向组织上反映，成了首要的任务。

有一天中午，忽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要我立刻就去，有要事相商。我匆匆赶到马霍路（即今黄陂路）进益里某号楼上（同盟会的秘密接头处），有陈其美、姚勇忱和其他两人在座。陈其美正经其事地对我讲，大意是：“姜统领已与光

复会秘密接头，准备首先反正，响应武汉。这事当然很好，不过光复会的联络是靠不住的，”他知道我与姜統領是世交，要我設法把姜拉到同盟会这边来。又說：“姜已得了光复会一笔錢，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費。”我回答說：“我从未过問运动军队的事，既然如此，让我相机进行。”陈說：“事机紧迫，必須在两三天內有切实回信，”并要我注意三点：（一）事关秘密，不可稍露风声，使姜知道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二）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調度指揮；（三）姜仍与光复会保持联络。接着陈又告訴我，有巡防營會計官王幼垣（注），湖北人，系同盟会會員，已由其負責运动巡防營的下級官兵，要我与王随时接头。姚勇忱从中插話說：“运动新軍是从下而上，巡防營是老軍隊，服从性极大，因此要从上而下。”我答应在一两天內回信，即告辭而出。行至房門口，陈其美附耳对我说：“你不要胆小，如果姜不听话，到了紧急关头，我們可以‘做了他’”。我想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革命党很着重暗杀。

当晚，我即与姜密談，姜表示：对革命毫无成見，不过要看南京的情形怎样，他不能先动。我便单刀直入地說：“听说老伯（我平日称姜为老伯）已与革命党秘密联络，准备首先反正，响应武汉。”姜闻言一怔，默不作声。我接着說：“請老伯放心，我同革命党也有往来，如实言相告，我还可以帮忙。”姜脸色微笑，拍拍我的肩膀說：“我早就疑心你是有把戏的。”他說他曾由一姓譚的广东人介紹，和黄汉湘

接过头，黃是湖南人，據說是黃興的亲信，而且是同宗，上海的革命由黃汉湘和李燮和負責，接头的地点在白克路（即今凤阳路）永年里；至于首先反正之說，决无其事，还是要看南京和苏州如何，再作决定。

王幼垣是姜的联襟，在巡防营任军需官，兼吳淞炮台军需官，我因为姜的关系早与其相識，但不知道他是同盟会会员。我訪王密談，王表示很好，他把巡防营和吳淞炮台的实力向我作了詳細介紹，彼此相約分工合作一致进行。王說，姜胆小多疑，他一直沒有向姜暴露他是同盟会会员，据王估計，如对姜以威力相要挾，使其帖然就范是不成問題的。

第二天晚上，我将接洽經過回报进益里，陈其美不在那里，由姚勇忱对我說：“上海要首先发动，不能等候南京。巡防营固然重要，可是海軍的情形很不好，要用吳淞炮台的力量来对付海軍。在上海安淮的軍队已有充分准备，我們要求巡防营中立，吳淞炮台首先响应。”他又說：“黃汉湘不是軍人，好說大話，其人原系同盟会，也可能与光复会有关系。李燮和等不是我們的人，不可信任，姜尽可与其‘虛与委蛇’”。他还說：“光复会专门同我們搗乱，破坏我們聯絡軍队的工作。”我問姚：“光复会是浙江的革命团体，你們都是浙江人，为什么要生意見？”姚說：“光复会以紹兴人为中坚，杭州人不多，浙江势力全在宁波与嘉湖人手里，只要他們不搗乱，我們也决不与其分家。”我們还談到外交情形、北方局势、上海道刘燕岐的为人，直到深夜始散。

經過几天的往返接洽，最后商定了这样几条：（一）巡防營不发难，任革命党人进攻制造局；（二）巡防營不攻城、不作战，純守中立；（三）吳淞炮台宣布独立，由各台官令詞請求总台官更換旗帜；（四）海軍出入不阻拦，不开炮，如无故对行动即听其自由；（五）如海軍侵犯炮台，即由各台采取自卫办法。由楊某（商人，已忘其名，此人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做过淞沪警察厅长）出面請客，被邀的有姜國梁、陳其美、李平书、朱葆三、王一亭、吳怀玖和我共十余人。大家并未提及約定內容，而在言詞之間却一致贊成革命。經此一番宴会，使姜坚定了倒向同盟会的决心。

王幼垣又对我說：“制造局有卫队一大队，枪械齐全，实力不可輕視，队官卢家有系一不識字的老粗，曾在巡防營当过哨官，他可以負責去运动。”我把此事告訴了陈其美，陈說：“不錯，已另外有人接洽了。”我回报了王，并囑其不必进行，以免分歧。

这时，革命形势已达到高潮，南京方面对姜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我很担心会不会起变化，特商之王幼垣。王說：“巡防營与吳淞炮台都有了切實布置，尽可放心，姜以地位关系，对他的部下自然不便有所表示，一俟时机成熟，即可按約行事，决无問題。”他又說，姜的公私銀錢以及巡防營和吳淞炮台的全部款項都在他的手里，更不怕它“走样”。我認為王的看法很对。

有一天，姜对我說，上海道約他去过几次，諄諄告诫他

要“尽忠报国”，严防革命党，并在必要时调他镇压上海城厢地方。姜回答说，他的部队极为稳定，足以维持地面而有余，如另调外处军队到上海驻防，反而不妙。姜又秘密告诉我，听说南京徐总统（指徐绍桢）并不反对革命，大概也同革命党有了联络。我听见这个消息，当然顺着他说是“有的”。

从陈姚等人的谈话中，我得知吴淞炮台比巡防营更其重要，很想知道那里的情形究竟怎样。王幼垣约我到炮台一行，我们到总台部见到了南台台官施泽（号冠西，南通人）、北台台官潘碧澄（湖北人）、狮子林台官于连会（天津人，光复后改名春会，升任总台官），还有四五位副台官。开了第一次秘密会议，我在谈话中提到姜统领已赞成革命，吴淞炮台的独立方式是由各台官合谋请求总台官更换旗帜，希望大家建功立业，共襄盛举。各台官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发言慷慨激昂，使我很受感动。他们还自动表示，如海军侵犯炮台，即起而与之作战。

当晚，我将此行经过报告了陈其美，陈很欣慰，但是他说：“不怕他们不听话，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打进炮台。”我总觉得陈对于炮台的情形不大明了，未免有些夸张，只好“妙妄听之”，随说随了，我没有把陈的话语告诉姜王，以免引起误会。

上海光复，首先是革命党人进攻制造局。所用兵力，以商团为主，配合了一部分警察、市民和青年学生。所用

器，只有长枪和手枪，实力也并不充足。其所以敢于进攻制造局，一则由于革命军的声势夺人，二则由于制造局的卫队已说妥内应。谁知卫队方面并未接洽妥当（听说接洽的人系借此骗钱），竟起而抵抗，革命军一触即溃。陈其美亲自前往劝说，被其扣留，次日攻克制造局才得释放。

在革命军进攻制造局的同时，巡防营不但如约严守中立，还派出军队放哨维持地方秩序。高昌庙如此，南市、闸北以及浦东那样辽阔的地区也是这样，做到了地方安谧，七憎不惊。它并掩护革命军如商团等之溃退。

吴淞炮台方面，南台、北台和狮子林台，当日即扯上白旗，宣布独立。所有官兵都上了炮台，卸下炮衣，准备作战。驻在吴淞和宝山的巡防营同时放出步哨，与炮台密取联络。驻在浦东和吴淞的缉私营也派人和巡防营接洽，相安无事。

上海光复后，开会选举沪军都督，大家推举吴佩孚，姜不自愿就，举陈其美以自代。后来姜对我说：“这次选举都督，秩序不佳，喧扰四五小时之久，才最后推定陈其美。”李燮和在吴淞成立一军政分府，实权由黄汉湘掌握，与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各不相下。陈屡次约我和姜密商，拟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姜不愿做恶人，无结果而罢。吴淞军政分府以经费无着，不久也就结束了。

注释：王幼宣已年逾八十，过去在正泰橡胶厂工作，现已退休，居住上海。

（上海市人委参事室，上海市文史馆供稿）